

【一般論文】

消失的多元想像：論社會學中理論與 經驗的關係 *

黃厚銘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The Disappearing of Plural Imagin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Sociology

by

Hou-Ming H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ermes@nccu.edu.tw

摘 要

本文企圖回顧 Weber、Durkheim 與 Marx 等社會學三大家在方法論的著作中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藉由比較三人對此議題之不同見解來呈現社會學在建制化之初即便努力躋身科學之列，仍保有對此議題之多元想像。其次為了理解深受美國影響的台灣社會學主流相關主張之基礎，本文也以 Habermas 對知識旨趣的分類總結了前節的討論，並作為理解美國實證社會學獨大的基礎。據此比較 Parsons 及其學生 Merton 對此一議題之主張。最後，呈現美國社會學主流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實際上是落實為台灣社會學界對理論研究與教學上的看法與制度變革。

關鍵詞：實證主義、中程理論、理念型、批判理論、反身性

一、前言

2018年，為了提昇國內社會學博士的水準，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號召下，結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等四個單位的聯合博士班開始招生。招生採個別招生，但共同必修課程則為四單位師資輪流主導開授。除了共同必修課程以外，各系仍能顧及既有的特色與傳統，針對經由該系招生管道入學的博士生另增訂必修課程。在此一變化下，臺灣大學改變過去的課程設計，將「社會學理論」課程排除於必修課程之外。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則仍保留三學分的「社會學理論」必修課程。而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則早在成立之初，即無「社會學理論」的必修課程，而是另以一門經典研讀性質的課程「社會分析基本著作」，從經典中學習重要社會學家的研究技法。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各大學的社會學系皆以「社會學理論」為大學部的基礎必修課程之一，卻又可以缺席於招生來源越來越多元、也就是越來越多非科班出身的碩士班或博士班必修課程之列。甚至，整個取消「社會學理論」課程的呼聲也偶有所聞。例如，早在2016年，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林宗弘亦曾於「巷子口社會學」網站發表〈小國的學術魔球〉一文，指出台灣社會學界「還活在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裡，台灣學界不打魔球、還在打土法煉鋼的紅葉少棒，強調博士班的古典訓練，或是選秀時堅持要有『傳統社會學的理论深度』……」，進而對台灣社會學的發展提出幾項建議，包括「從博士班開始，在研究與教學方向上鼓勵擺脫經典社會學文獻」與「減輕博士班的經典專書閱讀而增加跨學門創新議題的期刊論文閱讀」等等（林宗弘，2016）。

這些具體的制度變革與論述所反映出的，正是台灣社會學主流對於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界定，就是一門「經驗科學」，而有別於諸如哲學等學科。有趣的是，至今絕大多數的「社會學理論」課程都會介紹或研讀一百多年前的 K. Marx、E. Durkheim 與 M. Weber 的思想著作，甚至還可能上溯更早的社會學之父 A. Comte。這種重視經典教育的做法，相較於自然或工程科學這類更被承認為「經驗科學」學科之訓練，是更罕見的。也無怪乎前引文章會主張削弱經典閱讀與研究在台灣社會學教學與研究中的地位。更不用提「社會思想史」或「社會哲學」之類課程，早就由必修課程變成選修課程，進而消失在大多數社會學系的課程表之中。其中社會學與社會哲學或與社會思想史之間的區別，關鍵又在於科學與哲學之間、或是經驗與理論之間關係的看法。以（實證）科學取代哲學（玄學），自社會學成立之始，就已經是社會學之父 Comte 的主張。而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問題，至少是 Weber 與 Durkheim 社會學方法論著作的討論焦點。而兩人的方法論論述也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教學的重要主題之一。

但除了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對社會學理論的定位以外，其實社會學理論，特別是社會學方法論的論述，本就是社會學家對社會學作為一門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科學」之界定。本文即是企圖回顧 Weber 與 Durkheim 這兩位名列社會學三大家的學者在方法論的著作中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藉由比較兩人對此議題之不同見解來呈現社會學在建制化之初即便努力躋身科學之列，仍保有對此議題之多元想像。至於，Marx 則從未以社會學家自詡，也未曾在學院內任職，因而沒有社會學方法論方面的著作。但不可否認地，Marx 堅持其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分析是絕對具有科學性質的。因此，本文除了設法從 Marx 的著作中釐清他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以外，

也將討論繼承 Marx 左派傳統的「批判理論」對此一議題的主張，以便在缺乏直接的方法論論述下，拓深對於 Marx 有關此一議題的立場之了解。

其次為了理解深受美國影響的台灣社會學主流相關主張之基礎，本文也以 Habermas 對知識旨趣的分類總結了前節的討論，並作為理解美國實證社會學獨大的基礎。據此比較了 T. Parsons 及其學生 R. K. Merton 對此一議題之主張。即便 Parsons 與 Merton 之間存在著師承關係，實際上，兩人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差距不小。如此，才能夠給予 Parsons 正確的評價，並充分理解相對於 Parsons 的鉅型理論，Merton 所提出的中程理論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主張。因為後者正是美國社會學主流實證主義的基礎。

最後，本文在說明了美國社會學化約了「理論」的意涵為「經驗理論」，並排拒了 Weber 與 Marx 在方法論上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見解、與 Parsons 的所謂的理論體系之後，進一步呈現美國社會學主流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實際上是落實為台灣社會學界對理論研究與教學上的看法。並反映於本文開頭所說的課程設計等制度變革。

本文認為，比較過去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多元想像，有助於凸顯台灣社會學主流對此議題日漸單一化的走向，希望藉此重新開啟已經逐漸被關閉的可能性。社會學理論研究，特別是針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方法論討論，即是社會學對自身科學性的自我反省。強調自身作為現代社會自我反省的社會學，當然也不應迴避藉由此類方法論的論述所進行對社會學的自我反省。進而，本文此一理論性質的討論，正是企圖呈現社會學理論在社會學的自我反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古典社會學理論三大家的理論構想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裡面，社會學方法論方面論述最多的 Weber 曾經在“‘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1949）（〈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一文的後半部，很明確宣稱，他所要處理的是「理論與理論性概念建構對於我們文化實體的知識有何意義」的問題（Weber, 1949: 85）。這可以說是三大家裡最清楚直接處理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之中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文章。Weber 承繼新康德主義的傳統，把 I. Kant 知識論中的範疇與知識的關係，轉化為理論與概念對於文化科學或社會科學知識的意義問題。

Weber 的基本預設是：

有限的人類心智對於無限現實（reality）所進行的一切研究乃基於一個不言自明（tacit）的前提，那就是只有一小部分的現實構成了科學探究的對象，這一部分是由於「值得被認識」而顯得重要。（Weber, 1949: 72）

這句話顯示，相較於 Kant 訴諸人類腦袋中先天（a priori）且超驗的（transcendental）範疇在人類知識建構上的角色，Weber 首先強調價值關連（value relevance）的影響。因此，Weber 指出：

影響任何事件的原因通常有無數個、有無數種，然而，它們本身並不具備任何元素足以使得某些原因凸顯出來、成為值得注意的。正經八百地企圖「毫無預設」地分析事實的唯一結果是，對無窮個別事件之「存在判斷」的混亂。……（按：反之）如果只

有一部分的具体事實，因為和我們分析事實的文化價值相關連，才引起我們的興趣，或對我們是有意義的，那麼秩序才會加諸於混亂之上。只有無限複雜的具体現象之某些面向，亦即那些我們賦予普遍文化意義的現象是因此值得認識的，它們才是因果分析的對象。(Weber, 1949: 78)

接著，Weber 再把 Kant 知識論中的範疇轉變成他筆下的「概念」，而指出：「概念是對經驗資料予以智識性掌握的基本分析工具」(Weber, 1949: 106)。

就他對歷史歸因的興趣，Weber 所著重的是，面對有如 Kant 知識論中的雜多般之歷史多因性，研究者除了依據其自身的價值關連來選定研究的取徑以外，又如何藉由理論與概念的引導來進行因果解釋的問題。因此，緊接著關於科學與價值判斷或價值關聯的論述之後，Weber 在該文中，以「理論與理論性概念建構對於我們文化實體的知識有何意義？」的問題，帶入了他的「理念型」(ideal type) 議題。由此可見，理念型即是 Weber 對前述問題的解答，並總結前述關於無窮複雜的現實如何經由價值關連而得到整理與秩序的討論。換言之，理念型即是一種特殊的理論性概念建構方式，因而呈現出 Weber 對於文化科學或社會科學有關理論與經驗間關係的主張。

從而，基於這價值關連所導致的片面強調，Weber 主張，理念型是一種純粹建構，此一建構並不是現實的複寫，因此在現實中往往找不到完全對應的事實 (Weber, 1949: 90)。進而，緣於不同的評價觀點，可以構作出無數個這樣的烏托邦。甚至，Weber 還明確指出，科學的成熟即意味著對理念型的超越 (1949: 104)。以及，史學作為一門永遠年輕的學科，其核心任務不只表現於理念型的無常，也在於無

可避免要創造新的理念型。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此處所為理念型的無常與持續創造，並非如下述 Durkheim 筆下的理論那樣，是為了更加能夠呈現外在客觀的現實。原因在於，Weber 自始已經承認，理念型只是純粹建構，而非現實的複寫。

據此，Weber 亦將理念型區別於屬類概念（Gattungsbegriff）所具有的本質性與平均類型之意涵。進而基於其對歷史歸因的重視，更偏重理念型與發生學（genetischen）概念之密切關係（Weber, 1949: 93-94, 100, 106）。再考慮前述歷史多因性與新康德主義的基本立場，發生學概念必然是基於價值關連的純粹極端建構，而非實際運作於具體歷史底下的法則。相反地，Weber 也曾明確指出，抽象的法則只有啟發性的工具性意義，並且，越是抽象的法則對於個別事實的因果解釋反倒是越加無用的（1949: 76-80）。套回理念型的作用而言，理念型並非實際作用於經驗現實底下的法則。這一點一不同於下述 Durkheim 對於理論與經驗間關係的看法。

既然，Weber 是以理念型概念之提出來回答社會科學中所使用的理論與概念的特殊性的問題，我們可以這麼詮釋，Weber 心目中理論與經驗或經驗研究之間的關係，是 Kant 式的理論或概念（範疇）先行。亦即，是先有理論觀點，我們才能夠有如在黑暗中拿著手電筒一般，看到現實的一小部分。以及，由於價值關連的主觀與片面性，針對同一現實可以有無數個理論或理論性概念建構來加以分析。而 Weber 心目中科學的進步則在於有越來越多的理論觀點來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逼近無窮複雜的現實。總之，Weber 所構想的理論與經驗現實的關係並非一對一的符應關係，而理論也不是以符應經驗現實為依歸。因此，Weber 甚至主張，不存在對於文化或社會現象之絕對「客觀」科學之分析（Weber, 1949: 72）。反之，正如 Kant 哲學中範疇的

超驗性，前述的理論先行，也意味著理論是經驗與經驗研究成其可能的前提。

進而，就 Weber 認為社會科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並以歷史個體（historical individual）為研究對象的主張而言，理念型的建構也絕非社會科學的目的，而只是啟發性的工具或手段（Weber, 1949: 72, 102-103）。因為社會科學的目的是在理解與分析僅只發生一次、不會再重複出現的歷史事件。換言之，理念型作為 Weber 所謂的理论或理論性概念建構，只是讓研究者在切入觀點上有所指引，以便對照出現實的複雜，從而更能深入具體的歷史因果過程，而非以建構一個符應現實的理念型（也就是理論性概念建構）為目標。況且，正由於理念型是基於價值關連之極端、片面強調、與純粹的烏托邦式概念建構，根本無法在現實中找到完全相符的例證（1949: 90）。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完善化理論，以便使之符應現實。理念型與理論只是切入現實的工具而已，而具體事實的科學的認識對象則是遠離抽象法則，或與理論（理念型）必然有差距的具體現實或歷史個體。理念型只像是一個衡量的標準，或是衡量重量、或是衡量長度，這取決於研究者的價值關聯，而現實與此一純粹標準的差距，是為了讓我們更加理解現實。換言之，歷史現實的因果過程很可能是符理念型的概念建構的，正如台灣歷任總統的統治基礎，從未是純粹的傳統型、法治型，或是聖雄型，但以這三類理念型作為衡量標準確有助於我們具體理解各個總統的實際統治基礎，而且，往往是混雜了三類的其中兩類或三類的。

相較於此，自稱為「理性主義者」的 Durkheim 深信：

我們唯一接受的（按：稱呼）是理性主義者。其實，我們主要的

目的是，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證實人類行為可以被化約為原因和結果的關係，而這關係可以藉著一樣理性的操作被轉化為未來行動的規則，以藉此拓展科學理性主義的視野到人類的行為。被稱為我們的實證主義的，只是這理性主義的結果。(Durkheim, 1982: 33)

實際上，這段引文一方面呈現出 Durkheim 排拒被貼上近似哲學學派的標籤，這一點與 Comte 區分哲學與科學的主張有關。而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理性主義者」標籤只是基於他對理性信仰。進而，將理性落實為具體的科學研究，必然可以建立有關人類行為的因果法則。因此，在 Durkheim 眼中，Comte 所宣揚的實證主義，其實也只是理性主義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可靠的知識並不是哲學，而是科學。所以基本上，Durkheim 是排斥這些哲學學派的歸類的。

更進一步說，Durkheim 的主張蘊含了一種 S. Lukes 所謂的實在論立場（收錄於 Durkheim, 1982: 11）。而深信事實的客觀實在，以及把知識與此客觀實在的符應視為一切研究的正誤判準（Hirst, 1975: 93）。也因此，Durkheim 心目中科學的成立在於其研究對象之客觀實在，並以此將社會學區分於哲學。進而據此，再以社會事實（social facts）之實在性，使社會學獨立於只承認心理事實的心理學之外，從而確立社會學這門新科學的地位（Durkheim, 1953: 33; 1982: 36-37）。

基於這樣的信念，與前述 Weber 的理論先行立場完全相反，Durkheim 主張：

由於事物的外在性質是經由感官而顯露給我們，因此，我們可以歸結如下：為了要成為客觀的，科學必須從感官知覺出發，而不

是從獨立於感官知覺而形成的概念出發。(Durkheim, 1982: 81)

顯然這也迥異於前引 Weber 否認絕對客觀之主張，這甚至使得 Durkheim 堅決反對任何先見 (Durkheim, 1982: 62)，而不同於 Weber 承認價值關連或理論觀點的必然影響，尤其是片面性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即便 Durkheim 不喜歡實證主義這個稱號，而更傾向於理性主義的稱號，但其社會學方法論確實展現出實證主義的色彩。其表現在於，預設了一個客觀外在的現實，從而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職志便是，以其所建構的以因果法則為具體內涵的理論來符應此一經驗事實。並且，此一因果關係是單一、互斥的，針對同一經驗現象的不同因果解釋之間，絕對有對錯之分。H. Marcuse 即如此定義「實證主義」：「(1) 根據對事實的經驗來確認認知思維 (cognitive thought) 的有效性；(2) 認知思維傾向於將物理科學視為確定性和精確性的典範；(3) 相信知識的進步必須以此為方向」(馬庫色，劉繼譯，2015，頁 237)。這也完全不同於 Weber 認為針對同一現象可以建構無數的理念型之主張。

因此，Durkheim 堅持：

解釋事物，簡言之，就是以一個確定的秩序來安排我們關於它們的觀念。這預設了一個存在於事物自身中的秩序，並且，這些事物形成了連續的序列。這個序列是如此地相關，以致一個特定的效果總是由同一個原因所產生，而且絕不會由其他的原因所產生。(Durkheim, 1975: 10)

這段引文不僅顯示出 Durkheim 所謂的理论即是因果法則，並

且，其心目中的因果法則是一因對應到一果的因果關係。而不存在諸如多重因果網絡這樣的可能性。如此我們才有辦法以理論假設和虛無假設之間的二元對立，或共變法、控制變項等方法，來排除虛假關係，並區辨不同解釋的真偽對錯。而這完全呈現於 Durkheim 在《自殺論》等經驗研究著作中的推敲與推論。

進而，Durkheim 心目中科學的進步就在於在真偽對錯之辨的過程中，逐步逼近這客觀外在的現實而得到相關的真理。顯然，連有關所謂學術或科學進步的構想，Durkheim 也與 Weber 以越來越多的觀點來捕捉多面而複雜的現實之帶有發散性的看法截然不同。相反地，Durkheim 則是越來越收斂於普遍客觀的唯一真理（理論）之上。這也符合前述 Marcuse 對於實證主義的定義。實際上，這方法論上的見解，也完全清楚地呈現在 Durkheim 諸如自殺或宗教的經驗研究之上，使其急於否定生理學或心理學的解釋，以便凸顯出社會學解釋的有效性。而 Durkheim 對自殺現象等等所做的類型學建構，則正是 Weber 筆下依「屬加種差」的方式所建構的「平均類型」（average type），因而是自然科學式的與本質性的概念建構（Weber, 1949: 90, 93；韋伯，于曉等譯，1988，頁 30）。¹ 也因此，即使 Durkheim 深知數量上的普遍性（generality）並不同於集體性（collectivity）（Durkheim, 1984: 57; 1982: 54），終究卻也為了讓社會事實可以被客觀的感官知覺所測量而仍以量化的普遍性來定義社會事實（Durkheim, 1982: 104）。這恰恰反映了兩人對於社會科學與自然

¹ 也因此，葉啟政（2005）以 Durkheim 的平均類型（average type）和 Weber 的理念型相對照，來指出兩者對於「典型的」、「具代表性的」之不同理解。Durkheim 的平均類型在意的是事物之間在本質上的共同點，而 Weber 反而在意的是「具體現實」的特殊例外。這本身就蘊含了兩種對科學的不同構想。而本文則聚焦在其背後有關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看法。

科學之間關係看法的差異，而在確立社會學的科學性質之方法論論述中呈現出極大的不同。

相較於致力於確立社會學的科學性質之 Weber 與 Durkheim，實踐性格強烈的 K. Marx 並沒有社會學方法論的論述。因此，我們只能從其著作中來透析出 Marx 所認為理論與經驗之間的看法。

無庸置疑，Marx 在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資本論》) 等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分析絕對是以掌握經驗現實的運作為目標。但與此同時，Marx 承繼 F. Hegel 的辯證法思考方式，卻未必是他自己對經驗現象的觀察所得，而是閱讀 Hegel 著作的心得。頂多，我們可以說，是在閱讀 Hegel 的哲學著作之同時與 Marx 自身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觀察體驗相互循環印證的產物。

此外，更重要的是，Marx 的著作並不僅止於這類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分析，一方面還包括其對尚未實現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描述。這部分論述，甚至也出現在其《資本論》之中。例如，Marx 提及自由人的聯合之狀況 (Marx, 1990: 171)。同理，在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2000a) (〈1844 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 之中，儘管 Marx 以異化勞動來描繪資本主義體制下工人的處境，但不只這部分的討論一樣深具 Hegel 辯證法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其有關人類類本質的主張，即便不算是一種哲學上的人性論預設，所謂自由自覺的勞動也至少並不見於他當下的現實社會之中，甚至是否為 Marx 的歷史研究之成果，也是頗有疑義的。

換言之，Marx 所界定的人類類本質並不是現實社會的經驗現象。毋寧地是一個用以批判現實、指出現實之不公義的價值判準。同理，其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除了對照出現實的醜陋以外，也當然是對於未來的理想。既然是理想，就是在現實之中還未實現，至

多只能尋得朝向此一發展的跡象而已。

由此可見，儘管 Marx 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分析是以客觀具體的經驗現實為對象，但其有關類本質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尤其是基於此二概念建構與現實的差距，則更適合用一般理解中的「理論」二字來加以描述，並不是對經驗現象的描繪，而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反而，這兩個概念的作用與意義恰恰在於其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以便凸顯現實的不符正義，進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亦即，理論既不是用多元發散的觀點來分析現實，也不是以單一收斂的方式來形成有關現實的真理。而是以其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來發揮「批判」與改變現實的指導作用。因此，Marx 才會在“Theses on Feuerbach”（2000b）（〈費爾巴哈論綱〉）中主張：「哲學向來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但關鍵在於改變世界」（Marx, 2000b: 173）。並成為他的墓誌銘。此處，解釋世界的理論只是為了符應現實，相反地，改變世界的理論則是讓現實符應理論。這部分的理論，或許會因為其烏托邦性質與缺乏經驗基礎而被實證主義者所拒斥，但如果沒有這部分的理論，其實我們也很難理解 Marx 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分析與批判之意義。

實際上，Marx 的這一部分的理論正是啟發了 M. Horkheimer 的開山之作“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1972）（〈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的關鍵。因此，我們不妨取徑 Horkheimer 的討論來更加深入理解這種繼承自 Marx 之對於理論與現實之間關係的看法。

藉由與以符應現實的傳統理論之比較，Horkheimer 指出傳統理論的實證主義色彩將使其因為解釋了經驗現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合理化了現狀（Horkheimer, 1972: 194-197）。他說：

（按：傳統）理論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是有關一個主題的命題之總和。這些命題是如此地相互關連，以致一小部分是基本的，而其他的命題則衍生自這些基本命題。……理論的真實有效性取決於衍生命題與真實事實的一致。如果經驗與理論相互衝突，其中之一就得接受重新檢視。（Horkheimer, 1972: 188）

顯然，所謂傳統理論就是前述 Durkheim 構想中的理論，是以符應現實為依歸。

相對於此，批判理論的精義恰好在於以基於價值而形成的理論來拉開其與既有現實的差距，而對經驗現實進行批判，進而引導實踐的方向。因此，「具有批判心智的人與其社會的證同（identification）是以張力（tension）為標誌。張力是批判思考的概念之特徵」（Horkheimer, 1972: 208）。這張力也意味著，理論的價值或有效性並非在於與經驗現實的符應關係，反而批判理論是著眼於改變現狀，因此直到達成此一目的之前，並不存在相應的具體感知（Horkheimer, 1972: 220）。本文前述 Marx 的類本質與共產主義社會即是如此。因為尚未實現，當然也不是可以被經驗研究當作研究對象的經驗現實。這主張完全否定了 Durkheim 所堅持的，依據經驗現實來構作與之相符應的理論。所以，Horkheimer 指出：「這種（按：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與幻想（fantasy）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未來的圖像決定了人類的思想與行動，即便是在事件的過程似乎朝向遠離此一未來，並證成了除了實現此一未來的信仰以外的任何其他反應。但這圖像實際上是來自對當下的深刻理解」（1972: 220）。幻想就其負面意義來說，即是不切實際，也就是不符經驗現實。但批判理論之不切實際，一方面是基於對現實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其不切實際也正是批判的力道之所

在。換言之，在實證主義者眼中，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將動搖了理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但對於批判理論而言，這差距正是批判的意義之所在。類似於此，P. Bourdieu 也曾在探討社會學知識中的法則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時主張，正如 Galileo 發現自由落體的法則並無礙於飛行的夢想一般，社會學的法則並非無可改變的宿命。而是讓我們藉著對機制的理解，以便使得現實朝向合乎我們的期待（in line with our wishes）的方向發展。甚至，Bourdieu 還進一步指出，一定程度的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之必要性（Bourdieu, 1990: 182-183）。儘管法國的 Bourdieu 並非德國的批判理論，但這些說法都呈現出價值與非現實性在社會學知識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與實證主義或價值中立的主張有所不同。

顯然，批判理論此一學派，之所以被歸類於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基於此一不同於 Weber 與 Durkheim 之對於理論與經驗現實之間關係的構想。亦即，所謂的進步並非尋得越來越逼近客觀外在現實的理論，而是面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張力關係，藉由實踐使得現實逐步向理論靠近。理論如果會變化，不是因為被現實所否證，而是在實踐的中介下發生變化的理論與現實之關係（Horkheimer, 1972: 234, 241）。

三、從 Habermas 的知識旨趣分類觀察美國社會學理論的實證化

J. Habermas 在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1971) (《知識與人類旨趣》) 一書中，依據不同的知識興趣而將既有的知識區分為三

大類。實際上也恰好幾乎對應於 Durkheim、Weber 與 Marx 三人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不同看法。首先是經驗—分析的科學，其知識旨趣在於法則的預測與控制效果。用前節的措詞來說，即是在理論通過經驗的檢證而成為符應經驗現實的法則後，藉由衍生命題來進行預測，進而可以在技術上控制現實的發展變化。其次是歷史—詮釋的科學，其知識旨趣在於對意義的詮釋與理解。但理解並不只是把研究對象視為客體（object），而是在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關係中，實踐性地一方面凸顯出研究者的先在了解（pre-understanding）之作用，另一方面也以此為基礎來理解其研究對象。但也在對研究對象的理解中，回頭重構自己的前理解。雖說，Habermas 認為這將朝向兩個意義主體之間的共識。但我們也可以發現，擺脫原來的理解而形成新的理解是此一知識的必然。用前節的措詞來說，就是有了不同於原來之對經驗現實的認識。這一點多少接近 Weber 以更多的理念型來逼近經驗事實的主張。更重要的是，Weber 的理解社會學原本就是凸顯出對社會行動的意義之掌握是人文社會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的額外成就（韋伯，顧忠華譯，1997，頁 25）。因此，本文將之歸類於 Habermas 所界定的歷史—詮釋的科學。最後則是批判的社會科學，其知識旨趣在於從被意識形態所固定下來的現實依賴關係中解放出來。因此，此一知識預設了現實之可變性。用前節的措詞來說，即是理論並不輕易接受經驗現實的現況，而更可能是未來導向地希望藉由實踐來使得現實更加符合我們對於公平正義的價值設定。

Habermas 此一分類架構當然是為了賦予批判理論作為知識的正當性，以對抗以實證主義為尚之經驗—分析的科學獨大之現況。用前節的措詞來說，即是在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上，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構

想。而這三種知識類型各有其知識旨趣，也各有其正當性，不能相互否定或化約。如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用 Habermas 的主張總結前節的討論；另一方面，也據以觀察此種對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多元想像在美國社會學中逐漸消失的情況。

然而，正如 C. Wright Mills 在《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所欲指出的，這種承繼自 Marx 的批判性知識，在他所謂的抽象經驗論與鉅型理論之夾擊下日益萎縮（米爾斯，張君玖、劉鈐佑譯，1996）。但為了理解此一發展趨勢，我們必須從 Parsons 和其學生 Merton 之間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差異入手，方能同時掌握 Mills 所批判的兩種發展趨勢之分合關係。

首先，Mills 所謂的鉅型理論即是 Parsons 所建構的理論體系（theoretical system），但建構社會學有別於其他學科、尤其是經濟學之理論體系，正是 Parsons 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其所謂的理論體系是為了區分於經驗理論（empirical theory），後者即是前文中以符應現實為目的之理論。而理論體系則僅僅是一套語彙與概念架構用以作為社會學研究者分析經驗現象與相互溝通對話之用。理論體系並非一組內在邏輯一貫的經驗性命題，亦非從經驗現象歸納研究所得。相對於此，理論體系中所包含的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演繹而來，並且不是實證主義習於進行的操作化之經驗性演繹——也就是從基本命題演繹出可供經驗驗證的預測性衍生命題。相反地，理論體系中的演繹是分析性的演繹（漢彌爾頓，蔡明璋譯，1990，頁 7、67、73）。因此，Parsons 說：「當然，這裡所謂的『理論』的意義，並不是指關於某一類具體現象的經驗概推，而是指一個抽象的、分析性的『概念格局』」（帕深思，黃瑞祺編譯，1984，頁 112）。亦即，Parsons 的理論體系無法為經驗現實所驗證，而是提供概念架構來作為形成經驗理

論的基礎 (Parsons, 1968: 9)。就如同物理學中的 $f=ma$ 一樣，只是分別界定了力、質量與加速度，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而這等式是一種概念定義上的關係，不是可以被經驗現實所檢證的命題。由此可見，Parsons 的意圖是讓社會學能夠像已然確立其科學地位的物理學那樣，有自己的一套語彙與概念架構，不致停留在爭辯基本概念的定義、無暇面對經驗現實之階段。但即便 Parsons 真正的目標是讓社會學能早日面向其經驗現實的研究對象，其為自己設定的任務則主要是這套概念架構的建立。也就是有別於經驗理論的理論體系之建立。在寫作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1968) (《社會行動的結構》) 一書時的具體成果即是 Parsons 稱為「意願性的行動理論」之一套邏輯一致的理論體系。包括了此一理論體系所包含之一般性概念的定義，及這些概念之間的推論關係 (Parsons, 1968: 11)。正因為 Parsons 的理論體系全然是建立在分析性的演繹，Mills 才會以抽象理論名之，其理由即在於與經驗的 (符應) 關係並非理論體系建構過程的首要考量。

進一步來說，Parsons 的新康德主義色彩即呈現在其深信理論先行 (漢彌爾頓，蔡明璋譯，1990，頁 64-67)。循此，P. Hamilton 如此詮釋 Parsons 的觀點：「這樣的觀點意味著理論建構的，不只是事實的『再版』而已，實際上他是科學發展中的『自變項』。」此處所謂的理論正是前述的理論體系，而非經驗理論，因此，Parsons 明白指出：「理論不僅表述我們所知，也表述我們所想要知道什麼。亦即，我們需要解答的問題」(Parsons, 1968: 9)。舉例言之，只有我們有了「社會化」之概念才會注意到傳遞文化的價值與社會的規範而成為個人人格之一部分的諸多機制，像是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介等等。據此，我們才可能以經驗研究來呈現這些機制在社會化中的角

色。甚至，Parsons 還企圖以其四功能典範來演繹出一個涵蓋所有人類處境 (human condition) 的宏大理論體系，並藉此來給予至今一切的知识各自的定位，以便這些知識的研究者可以知道相互的關係和相互的限制與貢獻。

從而，我們將很容易可以理解 Mills 在〈鉅型理論〉這個章節中所引用、並批評為不知所云的 Parsons 書中段落為何會是如此模樣（米爾斯，張君玖、劉鈞佑譯，1996，頁 60-68）。簡言之，為了構作其社會學的、乃至於涵蓋一切人類知識的理論體系，Parsons 深陷於其概念之間分析性演繹的多寶格般迷宮當中，而無暇面對經驗現實。但這卻是 Parsons 的有意選擇。

也正是看到這一點的「缺失」，相對於鉅型理論，Merton (1968) 提出了中程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的概念。主張我們應該先致力於從經驗歸納中確立可以通過經驗檢證的理論，待累積更多的中程理論後，再將之整合為鉅型理論。換言之，Merton 認為建構鉅型理論的時機尚未成熟。但根據本節的討論，Merton 所以為的鉅型理論仍只是在於 Parsons 所界定的經驗理論之層次，只是更多經驗理論的綜合，而非理論體系。並且，從 Parsons 的立場來看，沒有理論體系，中程理論之間的整合為鉅型理論是不可能的。正如 Parsons 必然深信，沒有其分析人類處境的理論體系，至今的所有個別學科知識也無從知曉相互之間的關係一樣。無論如何，Merton 的中程理論、甚至他心目中未來的鉅型理論皆是以逼近經驗現實為依歸，而具有實證主義的色彩。

更重要的是，任職於 Columbia University 的 Merton，與 Mills 在《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中所批評的另一位當代社會學發展趨勢的代表性人物 P. Lazarsfeld 為同事關係。相對於稱呼 Parsons 所代表的趨

勢為鉅型理論，Mills 將 Lazarsfeld 所代表的研究路數稱為抽象經驗論，但實際上，此一趨勢的社會學研究都是「看似」具體的經驗研究。Mills 指出，這些研究者自詡為自然科學家，而代表自然科學的觀點。「其關心科學哲學更甚於社會研究」，這是 Mills 認為他們的研究抽象之原因。此處所謂的科學哲學，指的是自然科學背後的科學哲學。因而堅持只有一種科學方法，那就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米爾斯，張君玖、劉鈺佑譯，1996，頁 95-96）。Mills 認為這些堅持採用自然科學方法的研究者，實際上是不自覺地抱持某種方法論的立場。亦即，即便是最自然科學取向的研究，仍有其哲學或方法論上的預設。這就有如 J.-F. Lyotard 筆下敘事知識與科學知識的關係（Lyotard, 1984: 7-9）。科學知識實際上仍須以敘事知識為其基礎，但卻不斷排拒貶抑敘事知識。用本文的措詞來說，就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立場。如前所述，實證主義深信存在著客觀外在的現實，而理論發展的目的就是越來越逼近此一現實。進而，正如本文對以自然科學為模範的 Durkheim 之方法論立場所作的闡釋，一旦理論與現實不符，或是針對同一個經驗現實，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因果解釋時，必然是其中之一發生錯誤。因此，其理論發展模式是收斂性的，而非發散式的。同時，也更不會是實踐性地與批判性地讓現實向理論靠近，而是讓理論逐步靠近現實。

也因為 Merton 的中程理論作為 Parsons 所謂的經驗理論，在此實證主義方法論立場與 Lazarsfeld 的經驗研究有其親近性，而開展出當代美國社會學的主流。簡言之，Merton 正是葉啟政所謂的哈佛—哥倫比亞策略聯盟的關鍵人物（葉啟政，2018，頁 47）。此一歷史亦證成了 Merton 中程理論的實證主義性格。但也正如前述 Mills 所指出的，由於堅持社會學的自然科學與科學性質，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家

實際上已經接受了自然科學的科學哲學或方法論立場（米爾斯，張君玖、劉鈺佑譯，1996，頁 95）。但奇怪的是，卻又傾向於排拒更接近哲學的方法論相關的論述或研究。以現今社會學理論教科書或課程所涵蓋的內容為例來說，正如 Merton 的中程理論主張所呈現出來的，所謂的理论只剩下經驗理論，而不包括 Parsons 所致力理論體系與 Weber 或 Durkheim 都曾投入寫作的方法論著作。實證主義取向的社會學家或許會應用 G. Simmel 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所蘊含的抽象理論命題來進行經驗研究，卻拒絕閱讀 Simmel 的〈社會如何可能〉這篇非常具有 Kant 哲學色彩的文章。循此，由於社會學的每個次領域都有屬於該領域的經驗理論，像是社會運動有資源動員理論、相對剝奪論等等，並且，既然真正具科學性質的理論也只剩下經驗理論，而不包括理論體系與方法論，那麼實際上也不需要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理論」課程來講授各個社會學分支專業中的經驗理論，而應打散到各個分支社會學中。

換言之，正因為社會學理論被剔除了理論體系與方法論的內涵，而只剩下經驗理論的部分，社會學理論也就可以打散到各個社會學的次領域，而不再是獨立的次領域。這一點，光是從被 Mills 稱為鉅型理論的 Parsons 理論體系，到 Merton 所提出的中程理論的發展，就可以得知。用葉啟政的話來說，即是「於是，美國社會學所呈顯之具備著濃厚『實證主義』傳統色彩（特別是經過邏輯實證論的洗禮）的『經驗實徵』研究策略，遂成為主導整個社會學研究取向的基本（乃至於是唯一的）典範，甚至進而決定了所謂『理論』應當是怎樣個樣子（Merton 的中距理論說〔theory of middle range〕就是一個明例）」（葉啟政，2020，頁 2-3）。

有關美國社會學主流實證主義研究取向的議題，實際上葉啟政

《實證的迷思》(2018)一書第一章，即以長達 78 頁的篇幅予以回顧和描述。文中既有以 C. D. Cartrell 與 J. W. Cartrell 對 *AJS* 與 *ASR* 兩大期刊所刊登論文的分析，呈現量化研究佔比高達六、七成的情況；也引述了 Collins 於 1986 年抨擊美國社會學一直都在炒實證主義冷飯的文章，提到即便六〇年代引進了西方馬克斯主義與批判理論仍無以撼動實證主義主流。甚至，葉啟政也引述 Horowitz 於 1993 年點出美國社會學實用主義特色的文章，進而於該章第六節「邏輯實證論與實用主義的交匯：美國經驗實證主義的形成」之中，探討兩者的匯流。當然，葉啟政的分析美國社會學主流實證主義化的這一章也並沒有忽略實用主義與象徵互動論之密切關係，但也指出後來芝加哥學派從都市民族誌轉向以量化研究為主的發展。該章的第七節，亦指出 Parsons—Merton—Lazarsfeld 三角聯盟在美國社會學實證主義走向中的重要角色。葉啟政該文所徵引的豐富文獻顯示，「至今」美國社會學仍以實證主義為主流。本文無意重複葉啟政的貢獻，而是以理論與經驗關係為主軸，凸顯 Parsons 與 Merton 對於何謂理論，仍有著重大的差異。進而強調 Merton 中程理論構想在美國社會學主流實證主義的重要角色，以便連結到台灣社會學主流在論述與制度變革上所呈現對所謂「理論」的想像。無論如何，以 Parsons 的理論體系和 Merton 的中程理論相對照，並將之放置在 Mills 對鉅型理論和抽象經驗論的批評之脈絡中來理解，以便更聚焦於 Merton 與 Lazarsfeld 結盟的重要性，這是本文企圖有別於葉啟政而做出的貢獻。

至此，所謂的理论就只能是可以被經驗所驗證或由科學的研究方法資料搜集所得的理论才稱得上是理论。換言之，前述鉅型理论（或理论體系）與中程理论的關鍵差異在於與經驗之間的距離或關係，而非 Merton 以為所涵蓋經驗範圍在時空中的規模大小。前者並非直接

用以分析經驗現象的理論，而更像是概念架構的體系。而後者則以分析經驗現象或接受經驗檢證為目的。從而，原有社會學理論中所包括的理論體系的建構或方法論的討論都被排除在被界定為經驗科學的社會學之外。從另一個角度看，所有社會學的次領域，像是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等，都有其經驗理論。而無需「社會學理論」這樣一門獨立的研究領域或課程。

更有甚者，也因為不是基於實證主義的構想所形成的理論體系或方法論的討論被排拒在經驗科學的研究領域之外，在前述抽象經驗論與中程理論匯流的情況下，正如 Horkheimer 所指出的：「其他沒有將事實置入最熟悉的範疇，以及如果可能的話，放入中性的形式——數學的形式——的科學陳述，已然被指控為理論性的」（Horkheimer, 1972: 232）。這裡所謂的理論性的，是指不切實際的、不真實的。由此可見，在美國社會學的實證主義主流觀點下，理論還可能變成一個污名，而形成了反理論的傾向。不只除了經驗理論以外的理論構想被排拒在經驗科學與科學之外，連無法以量化的形式來表達的理論，也一樣被等同於理論、等同於不科學。² 當然更不會是社會學正當的研究與教學題材了。此一發展趨勢也完全合乎 Marcuse 對實證主義的描述：「將非實證的觀念污名化為單純的思辯、空想或奇談怪論」（馬庫色，劉繼譯，2015，頁 237）。進而，此即 Habermas 撰寫《知識與人類旨趣》一書的背景。亦即，以自然科學和實證主義為尚的「經驗—分析」的科學獨大，不僅壓縮了「歷史—詮釋」的科學，也否定了批

² 不過，在此必須強調，這只是實證主義的最極端的發展。實際上，實證主義仍可能影響與形塑著質化研究。像是謝國雄早年所力推的紮根理論，即是實證主義影響下的質化研究策略。其目的只是致力於把量化研究的邏輯落實在質化研究之中，使其理論建構能有如量化研究那樣「嚴謹」地從經驗歸納而來，而讓質化研究也能分潤到量化研究所據有的科學地位。

判理論立足於正義等價值或相應的理想藍圖，對現實進行批判的科學性與正當性。

四、美國社會學實證主義主流在台灣社會學的落實

如前所述，在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成為美國社會學主流的情況下，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多元想像逐漸單一化，相應的所謂「理論」二字的意涵也被化約為「經驗理論」，而不再包括方法論的討論、或是理論體系的建構。或是如前節所述地被當作一個等同於空想、缺乏根據的污名化詞彙。從而，在大多數師資來自美國的台灣社會學界，以社會學經典或社會學大師為主題的研究，也被當作「讀書筆記」，當然不屬「經驗研究」，因此被排拒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學之正當研究領域之外。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呈現在本文所收到的審查意見當中。³ 進而，在教學上取消「社會學理論」課程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恰恰發生在 2018 年台灣社會學界開始推動的「社會學聯合博士班」之規劃，也就是不再把「社會學理論」課程列為共同必修課。此一措施當然有其宣示上與實質上的意義與效果，簡言之，就是台灣社會學界都同意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訓練的必要性、甚至也都肯定社會學朝向公共化與實踐取向的重要性。但對於「社會學理論」是否應該成為台灣社會學的一個正當的次領域則沒有達成共識。以致只有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仍以個別系所的修業規定，把「社會學理

³ 本文的其中一位審查人即主張：「作者以讀書筆記方式（佔全篇論文五分之四的篇幅）整理各學者對於『理論』的看法。」

論」列為必修課程。

不過，實際上早在這之前，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的課程就不再把「社會學理論」列為必修課程。唯一看似類似研讀社會學理論經典著作的課程「社會分析基本著作」，其目的也只是在於從這些重要的經驗研究中揣摩社會學大師們的研究技法。亦即，所著重的是研究方法，而不是方法論的討論。當然用以當教材的經典著作也就不會包括 Weber 或 Durkheim 的方法論著作，更不會是 Parsons 建構理論體系的著作，而是具體的經驗研究著作。若以謝國雄所界定的社會學研究之三大正當研究方法——量化、田野、歷史——來看，方法論或理論體系的討論顯然是該歸屬於哲學家的工作，而不該是作為所謂「經驗科學」的社會學的研究領域。試問，以量化、田野與歷史三個方法來窮盡社會學正當的研究方法，本文附錄表格一、二中的學術論文，或學位論文，有多少會因而不被視為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學之研究論文？所以，湯志傑也主張：「結果，反實證論述在批判實證論篡奪科學之名的時候，卻也將『經驗研究』拱手讓給它。問題是，社會學自始便是經驗科學，不再是社會思想、社會哲學，也不是人文學。當強調理論取向者沒做出說服人的經驗研究，不免淪為一時的流行，無法有持久的影響力與累積」（湯志傑，2008，頁 601）。這主張不僅如本文開頭所述，區分了社會學與社會思想、社會哲學，還進一步要求理論研究者非得「做出說服人的經驗研究」。亦即，由於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身為社會學家不能僅以理論研究為職志，特別是理論體系或方法論的研究。對經典的詮釋更不會是社會學研究的職責。

以致於，似乎我們可以在 Weber、Durkheim 與 Marx 身上切分出具經驗科學性質的部分，以及前科學階段的哲學成分，並將後者摒除於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與教學之外。而在理解他們的思想著作

（其實更、應該說是研究）時，身為社會學家的我們只該以他們的經驗研究為師、僅能從中學習研究的技法。當然更不應閱讀 Durkheim 關於 Rousseau 或 Montesquieu 的作品，或是 Marx 有關 Epicurus 的作品。方法論方面的討論與研究交給哲學家從事，而理論體系的建構則只是像 Parsons 或 N. Luhmann 等少數天才方有資格作的事情。從而，身為學術邊陲的台灣社會學界，只該以本土經驗為基礎的經驗研究成果來參與國際大聯盟的賽事，方能有立竿見影的成效。例如，林宗弘（2016）在一篇類比美國職棒大小聯盟關係來談台灣學術發展的文章結論中建議：「（1）議題創新：從博士班開始，在研究與教學方向上鼓勵擺脫經典社會學文獻、開創新的學術議題或理論典範，才能推動典範移轉或快速掌握機會介入新興典範；受限於語言資本與歷史積累，過度強調經典訓練很難挑戰歐美學術機構。」以及「（5）改變博培：減輕博士班的經典專書閱讀而增加跨學門創新議題的期刊論文閱讀，承認社會、政治、經濟與地理等不同專業學門的學分，並且在博士班期間就鼓勵多位作者合作的期刊論文投稿，以及學會的公共參與、爭取發表機會以擴大接受專業審查的學習網絡，而非追求個人主義學術英雄式的經典專書寫作。」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藉由此一制度變革的時機，剔除「社會學理論」必修課，完全就是前述立場的落實。

站在此一立場上，不只是課程的規劃，實際上在何謂社會學的正當研究領域之界定，也早有相應的體現。以致光以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學界兩大主要期刊《臺灣社會學刊》與《台灣社會學》所刊登的理論研究性質論文屈指可數（參見附錄表1）。亦即，在以非常寬鬆的方式來界定理論性論文的條件下，實際上發表於核心期刊的理論研究論文還是佔比極低。而這還不只呈現於已出道的學者的研究成果發表空間之上，也影響了研究生們選擇論文主題的可能性。近年的統計顯

示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博士論文中理論研究的佔比極低，反而在非主流的社會學系所才比較有以理論研究為碩博士論文主題的可能性（參見附錄表 2）。亦即，越是具有主流地位的科系就越是少有研究生以理論研究為碩博士論文主題。學者的期刊論文發表，容或還可能有相同領域社群成員的相互欣殺或士氣等因素存在，但碩博士研究生的論文主題選擇，除了欠缺相關成果豐碩的角色模範（role model）以外，研究所必選修課程、教師個人的態度、乃至於所處科系的氛圍等等，都是決定因素。這特別表現在幾乎是以田野研究為唯一發展方向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已經有更多年完全沒有以理論研究作為碩博士論文主題。

當然，必須聲明的是，正如本文「多元想像」的標題所標舉的，本文並未否定量化、質化等經驗研究取向在社會學中的重要性，而只是好奇與慨嘆理論教學與研究空間的消逝。並聚焦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以古典社會學以降的發展來呈現原有的多元想像，以及後續在美國與在台灣的單一化發展。這也使得原來皆具有深厚哲學素養的 Marx、Weber、Durkheim 的學術訓練與背景顯得過時與落伍。在把社會學界定為經驗科學以有別於哲學之後，不只哲學訓練是不必要的，連同與哲學相近的理論訓練與理論研究也跟著洗澡水被倒掉了。

五、結論：邁向多元理論想像的未來

正如本文前面所引述的 Horkheimer 的話，「這種（按：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與幻想（fantasy）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未來的圖像決定了人類的思想與行動，即便是在事件的過程似乎朝向遠離此一未

來，並證成了除了實現此一未來的信仰以外的任何其他反應。但這圖像實際上是來自對當下的深刻理解」（Horkheimer, 1972: 220）。反身地說，本文也是基於對台灣社會學界實況的具體理解，以及對古典社會學傳統與美國實證主義社會學獨大的認識，試圖點出一個理想的未來的圖像。這個仍然有著多元想像的未來圖像，當然以其和現狀的差異而不會合理化現狀。相反地，是要對現狀展開批判。進而，凸顯出當下的一些空缺。具體而言，不論是教學或研究上，都應該肯定理論體系、方法論等討論的重要性，也應該留給前述因「不切實際」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的「幻想」或評價與批判的空間。否則，恐怕連 Parsons 的《社會行動的結構》或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的理論》都會因為逐一探討各個學者的思想著作，而被視為「讀書筆記」。

更清楚地說，本文無意否定實證主義的價值與地位，而是要指出實證主義獨大在當下台灣社會學界研究與教學上所產生的後果，以便為其他非實證主義式的社會學取向打開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本文也認為，實證主義如果要能夠擺脫 Horkheimer 所批評合理化現狀的指控，就必須承認所謂「不」科學的實踐或價值取向之正當性與重要性。在描繪了現實之後還需要問問我們自己，這是合乎公平正義的嗎？儘管這並不符合實證主義對於科學價值中立的見解。如此一來，就像前引 P. Bourdieu 所指出的，提出自由落體的定律，並不會讓我們無法飛行。而是讓我們在更認識運作於現實的機制之基礎上，再依據我們的價值來引導現實的發展（Bourdieu, 1990: 182）。在此，我們至少看到 Durkheim 的實證主義式理論與經驗關係的主張，與 Marx 的批判理論式理論與經驗關係的主張，不只各自得到正當性與生存空間，甚至還有相輔相成的互補效果。理論不僅可以從經驗歸納而來；也不只是像 Horkheimer 眼中的傳統理論那樣，只是把理論

視為有待通過經驗檢證的假設，以致在理論的研究與閱讀中，也僅止於提取可以用來操作化檢證的理論命題，或學習所謂的研究技法而已（Horkheimer, 1972: 188）。相反地，社會學理論還有方法論、認識論、甚或哲學人類學上的內涵。並且，不只具有經驗意義，也可以有規範意涵。

也因此，Bourdieu 主張：「有關機制的知識容許我們在某些地方決定能夠用來主宰這些機制的條件與方法，這個事實（按：讓我們知道）拒斥那種把可能當做命定的社會學主義無論如何都是合理的。以及，一直都存在著解放的運動來證明一定成分劑量的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或許有助於創造政治條件來實際地否定對於事實的現實主義觀點（a practical negation of the realistic view of the facts）。而這烏托邦主義由於是對現實的神奇否定，在別處也許會被說是精神官能症的（neurotic）」（Bourdieu, 1990: 183）。此處的烏托邦主義，正是前引 Horkheimer 的幻想。而實際的否定則有賴於對經驗現實的深入了解，以及據此的實踐。只可惜，在實證主義壟斷了對科學性質與對理論與現實之間關係的見解之下，這不切實際的成分劑量被輕易地貼上負面污名化後的「理論」標籤、被拒斥為不科學，以致於在被定義為「經驗科學」的台灣主流社會學眼中並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附錄

表 1 台灣社會學界主要學術期刊近十餘年之理論性論文列表與收錄論文統計

作者	年份	篇名	刊名	期	卷	頁碼
丁仁傑	2007	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	台灣社會學	14	/	1-49
賴曉黎	2013	幻象與共謀：布赫迪厄論秩序的自我持存	台灣社會學	26	/	1-36
夏傳位	2014	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	台灣社會學	27	/	141-166
丁仁傑	2012	靈驗的顯現：由象徵結構到社會結盟，一個關於漢人民間信仰文化邏輯的理論性初探	臺灣社會學刊	49	/	41-101
黃敏原	2012	俗世工作聖職化的社會學考古：韋伯《新教倫理》中對路德「Beruf」相關概念之推論理路	臺灣社會學刊	51	/	115-158
鄭作瑗	2013	時間生態學：時間社會學的新研究概念建立之嘗試	臺灣社會學刊	52	/	31-78
鄭陸霖	2014	道德經濟在消費社會中還有機會嗎？一個實質與形式分析雙軌並進的理論重構	臺灣社會學刊	54	/	181-232
黃聖哲	2016	危機與宗教性：論 Oevermann 的宗教社會學	臺灣社會學刊	59	/	187-218
張君政	2017	思考歷史能動力：原住民主點與批判的展演政治	臺灣社會學刊	61	/	185-221
陳嘉新	2020	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	臺灣社會學刊	67	/	237-246

刊名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計
台灣社會學	7	8	9	8	8	7	8	7	7	7	5	6	4	5	96
臺灣社會學刊	8	7	8	10	14	11	8	11	12	10	9	7	6	9	13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2 台灣各大學社會學相關科系近十餘年理論性碩博士論文列表與學位論文統計

作者	年份	篇名	校院名稱	系所名稱	學位
陳明君	2009	暴力與文明——暴力的「再」理解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謝亞君	2010	「價值中立」的諸神論戰——Weber、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謝奇洋	2009	從文化社會學到知識社會學——Karl Mannheim 的知識社會學考察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邱哲宏	2010	「財富」的社會學意義：以 Rothschild 家族史談財富創繼的可能與限制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王美淳	2010	否定的抑制與生成：T. W. Adorno 的文化工業與藝術作品理論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李辛瑩	2010	信用卡是不是錢？——Georg Simmel 的《貨幣哲學》之延續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陳續升	2015	何謂臺灣社會學傳統？——重返龍冠海、凌純聲、衛惠林的傳統繼承與轉化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陳忠岳	2017	「嫉妒」的社會分析——嫉妒、妒恨、怨恨、嫉羨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李晏佐	2017	尼采到底有多後現代？——從與哈伯馬斯的論爭中尋找答案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陳炳宏	2018	未來社會：新媒介複合科技下的知識與理論探究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陳建至	2011	消費社會及其缺憾：包曼 (Zygmunt Bauman) 「消費社會」論述之探究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蘇旻	2017	利益與權力——韋伯的支配社會學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張彥南	2007	傅柯晚期論主體與自我技術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吳駿盛	2011	另一種「經濟」與「市場」的社會學式經濟研究取徑——Karl Polanyi 的「實質經濟研究取徑」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劉定綱	2011	有緣社會中的民主——「結構行動」與「覺知行動」的雙重描述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林峰榮	2010	肉體證據：西方巫術論述中身體觀念的歷史與知識轉折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萬毓澤	2010	重新構作社會：浮現一系統論的觀點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吳鴻昌	2012	現代性的經濟想像：市場觀念在西方論述中的歷史與知識轉折	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吳秉儒	2009	佛教中觀應成派對 Axel Honneth 批判理論之反思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劉育成	2010	宗教與民主化：社會系統理論觀點的檢視與重構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
范國豪	2011	Gianni Vattimo 的後現代傳播理論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鄭智維	2011	消費社會中時尚的拜物教性質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陳涵	2012	暴力幽靈：閔讚德希達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龔雋嶂	2013	「台灣之光」：一種布希亞式的示現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陳玫瑰	2016	從社會學到美學的個體：齊美爾的印象觀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張志宇	2009	西方公共領域發展的社會想像根源——Charles Taylor 的觀點	清華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張敦為	2009	Norbert Elias 的文明理論——文明化、個體化、知識化的形態與過程	清華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朱慧芸	2008	意象巫術：邁可·陶席格 (Michael Taussig) 的文化觀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李長瀚	2008	乃若其激情——盧梭愛觀研究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唐文書	2008	貌合神離的自由：彼得·伯格人文主義社會學要義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莊信德	2009	田立克本體論政治神學對法蘭克福學派公共領域的批判性轉化——兼論台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的批判與建構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張郁玟	2011	拖延之社會學意涵——一個現代時間系統的研究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翁裕峰	2013	幸福社會學——建構幸福社會理念之研究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許智超	2014	魯曼論現代性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史迪威	2016	軟性極權主義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李宗棠	2015	必要的張力：社會學的知識生產策略	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碩士

校系	學位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計
東海社會	碩士	13	5	14	3	11	7	4	15	6	5	6	2	6	10	107
	博士	1	7	4	3	5	3	3	0	2	4	1	1	2	3	39
佛光社會	碩士	8	8	13	9	16	13	13	15	14	10	6	9	3	5	142
東華社會	碩士	/	/	/	/	/	/	9	6	3	3	2	1	3	0	27
政治大學	碩士	12	15	7	16	13	6	17	9	13	15	12	13	10	10	168
	博士	4	2	2	2	1	1	0	4	2	2	1	1	1	0	23
臺灣大學	碩士	12	18	9	15	11	8	11	4	13	8	9	13	13	3	147
	博士	1	2	1	5	1	2	2	0	5	2	0	1	0	0	22
清華大學	碩士	19	24	18	8	16	8	16	15	24	11	10	13	20	9	211
	博士	0	0	0	0	0	1	0	1	2	1	0	2	0	0	7
臺北大學	碩士	4	19	33	21	36	30	28	11	9	20	30	14	15	8	278
輔仁大學	碩士	/	2	5	13	6	7	5	3	10	7	2	10	5	1	76
東吳大學	碩士	14	29	18	14	15	21	26	3	9	12	7	8	17	5	198
中山大學	碩士	0	0	0	3	8	7	9	1	9	5	7	9	11	0	6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漢彌爾頓

1990 《派森思》，蔡明璋譯。台北：桂冠。

Hamilton, Peter

1990 *Talcott Parsons*, trans. by Ming-Chan Tsai. Taipei: Laureate Books.

馬庫色

2015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台北：麥田。

Marcuse, Herbert

2015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rans. by Ji Liou. Taipei: Rye Field.

米爾斯

1996 《社會學的想像》，張君玫、劉鈞佑譯。台北：巨流。

Mills, C. W.

1996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rans. by Jyun-Mei Zhang and Cian-You Liou. Taipei: Chuliu.

帕深思

1984 〈結構功能論在當前社會學中的地位〉，收錄於《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黃瑞祺編譯。台北：巨流，頁101-123。

Parsons, Talcott

1984 “The Present Status of ‘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 in

Sociology,” in Ruei-Chi Huang ed., *xian dai she hui xue: jie gou gong neng lun xuan du*. Taipei: Chuliu, pp. 101-123.

韋伯

1988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譯。台北：谷風。

1997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台北：允晨文化。

Weber, Max

198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trans. by Xiao Yu et al. Taipei: Gu Feng.

1997 *Soziologische Grundbegriffe*, trans. by Chung-Hua Ku. Taipei: Asian Culture.

林宗弘

2016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巷仔口社會學。查詢日期：2018年6月1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05/31/linthunghong-3/

Lin, Zong-Hong

2016 “siao guo de xueh shu mo chiou: ping huang shu ren ‘xiao guo de xueh shu kun jing’,” Street Corner Sociology. Available at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05/31/linthunghong-3/

湯志傑

2008 〈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收錄於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頁553-630。

Tang, Jhieh-Jieh

2008 “ben tu she hui xue chuan tong de jian gou yu chong gou,” in Guo-Xong Sieh eds., *Interlocution: A Thematic History of*

Taiwanese Sociology, 1945-2005. Taipei: Socio, pp. 553-630.

葉啟政

- 2005 〈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思考迷思的兩個基石〉，收錄於《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台北：群學，頁 1-71。
- 2018 《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上海：三聯。
- 2020 《從因果到機制：經驗實徵研究的概念再造》。台北：群學。

Yeh, Chi-Jeng

- 2005 “jyun zhih ren yu li san ren de guan nian ba bei ta: tong ji she hui xue sih kao mi sih de liang ge ji shih,” in *guan nian ba bei ta: dang dai she hui xue de mi sih*. Taipei: Socio, pp. 1-71.
- 2018 *shih zheng de mi sih: chong gu she hui ke xue jing yan yan jiou*.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 2020 *From Causality to Mechanism: A Conceptual Re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y of Empirical Research*.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外文部分

Bourdieu, Pierre

-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by M. Adam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urkheim, Émile

- 1953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trans. by D. F. Pocock.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Montesquieu and Rousseau: Forerunners of Sociology*, trans. by R. Manhei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by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trans. By W. D. Halls. London: Macmillan.

Hirst, Paul

1975 *Durkheim, Bernard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Routledge.

Horkheimer, Max

1972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by M. J. O'Connell.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Habermas, Jü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by J.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B.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a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3-121.

2000b “Theses on Feuerbach,”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1-174.

Merton, Robert

1968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9-72.

Parsons, Talcott

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Vol. I*.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eber, Max

1949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by E. A. Shils and H. 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pp. 49-112.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views of three major sociological scholars, Weber, Durkheim, and Marx,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heir methodological work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three scholars on this issue, we present the plurality of imaginations on this issue at the beginning of sociology's establishment, even as it strived to become one of the established sciences. Second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the mainstream sociological propositions in Taiwan, which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discussion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with Habermas'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terests, which serves as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ominant view of empirical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way, it compares the claims of Parsons and his student Merton on this topic. Finally,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view and teaching of theory in Taiwanese sociology are presented as a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U.S. sociology.

Keywords: positivism, middle range theory, ideal type, critical theory, reflexivity

Long Summary

In 2018, in order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PhD degree in sociology in Taiwan, a joint PhD program combining the facul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has been launched under the call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Admissions are on an individual department basis, but the common required courses are taught by the faculties of the four units on a rotating basis. In addition to the common required courses, each department can still take into account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ditions and create additional required courses for their own doctoral students admitted through the department's admissions pipeline. Under this change,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has changed its curriculum design to exclude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the required courses.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tains the three-credit "Sociological Theory" course as a required course. In contrast, the doctoral program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does not have a required cours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but rather a classical study course called "Basic Works in Social Analysis" to learn the research techniques of important sociologists from their classics.

Up to now, sociology departments in al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made "sociological theory" one of the required basic courses in

their bachelor's program curricula, but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required courses at these graduate institutes, despite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sources of enrollment to these graduate institutes, i.e., from more and more students in master's or doctoral courses that are not from the sociological background. Even calls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whole "sociological theory" course have been heard occasionally. For example, as early as 2016, Lin Zonghong, who works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lso published an article "The Academic Magic Ball of a Small Country" on the website of Street Corner Sociology, pointing out that the sociological community in Taiwan "is still living in Huang Shuren's 'Academic Dilemma of a Small Country', emphasizing the classical training of doctoral classes, or insisting on the 'theoretical depth of traditional sociology' when selecting candidates.". Lin then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Taiwan, including "encouraging the departure from classical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in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and "reducing the reading of classical monographs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and increasing the reading of journal articles on innovative issues across disciplines", and so on. Thes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discourses reflect the mainstream definition of sociology in Taiwan, which is an "empirical science"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hilosophy. The key to thi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r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From my view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in particular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is the key to define sociology as a "science"

distinct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views of M. Weber and E. Durkheim, two of the thre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olog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heir methodological works. B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s issue, the paper shows that even though sociology was struggling to become a sci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there were still multiple imaginations abou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ociolog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ber's concept of "ideal typ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e argues that the role of theory is heuristic, and that its purely constructive nature makes it necessarily different from empirical reality. But this gap forces us to confront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the historical individual. In contrast, Durkheim'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follows very closely the natural science model, which holds that theory must correspond to empirical reality.

K. Marx never claimed to be a sociologist and never worked in an academic institute, he did not write 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Marx insisted that his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s absolutely scientific in nature.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rying to clarify Marx'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his writings, this paper will also discuss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 on this issue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position on this issue in the absence of a direct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The Marxist tradition'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s distinct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Weber or Durkheim. Both Marx and critical theories emphasize the ideal or normative value behind the theory, and use the gap between the normative value of the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reality as a critique of the empirical reality. Therefore, not only is it not necessary for theories to approach reality, bu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transform the reality with our praxis, so that it can move toward the ideals and values that the theories aim at.

Second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the mainstream sociological tradition in Taiwan, which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discussion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with J. Habermas'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terests, which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ness of American empirical sociology. It compares the claims of T. Parsons and his student R. K. Merton on this topic. Even though there is a mento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sons and Merton, in fac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ir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his way, it is possible to give a correct evaluation of Parsons and to fully understand Merton's middle-range theory on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as opposed to Parsons' grand theory. This paper insists Merton's middle-range theory is the basis of the mainstream positivism in American sociology.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Parsons' life was dev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bstract theoretical systems as a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of human knowledge. Thus, although Merton's aim is to modify Parsons' line by establishing a more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individual middle-range theories into a mega-theory in the future, which is impossible in Parsons' eyes.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to loc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 middle-range theories. However, because Merton's "middle-range theory" 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t is able to match P. F. Lazarsfeld'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orm the basis of the positivist orient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The mainstream of sociology in Taiwan has inherited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from American sociology, thus advocating that there are theories in any sociological subfield an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n independent "sociological theory" course.

Therefore, after explaining that American sociology defines "theory" as "empirical theory" and rejects Weber'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and Parsons'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paper further presents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fact, it is the view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aiwanese sociology.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curriculum design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goes on to argue that a comparison of the pluralistic imagin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he past helps to highlight the increasing homogenization of this issue in the mainstream of sociology in Taiwan, in the hope of reopening possibilities that have been gradually shut down. Sociological theory,

especially th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is sociology's self-reflection on its own scientific natur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y, which emphasizes itself as a self-reflection of modern society, should not avoid self-reflection of sociology through this kind of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s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on this issue is an attempt to present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he self-reflection of sociology.